

真情流淌

记忆中的外婆

外婆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,可外婆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老人家是个极为乐观的人,那个年代谁的家里都不富裕,外婆却整天乐呵呵的,走东家聊天,串西家喝茶,即便口袋里没钱了她也从不用担心,因为只要她开口,哪个邻居都会借钱给她。

小时候,我们家的房前屋后各有一块菜地,一年四季种着各种不同的蔬菜,到了一些菜长成可以收割的时候,我们一家自己吃是绝对吃不了的。于是,外婆早早地对邻居们说,需要了就自己到菜地割去,想怎么割就怎么割。邻居们割了些什么、割了多少,外婆是一概不知道的。因此,家里的蔬菜虽说自给但永远不能自足,外婆还须每天一早挎个篮子去菜市场买菜。

她老人家也喜欢上街,有机会一路上和那些老姐妹聊天,才是她最开心的事情。

外婆的信息也因此极其灵通,哪家有个红白喜事,她总是第一时间知道得一清二楚。她最听不得的是谁家里揭不开锅了,或者穷得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了,这样的事情只要被她老人家知道,她一定会立马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旧衣服,理出一大包后给人送去,顺带着再塞点钱给人家。

记得我小时候,家里常年住着一个耳朵很聋的老人,是个一辈子讨不起老婆的光棍汉。他仅有的家当是一条小破船,靠着这条小破船以捡垃圾为生。这位老人什么时候住到我们家来的,连我妈妈都有些弄不清楚,只说是外婆见他可怜就让他住到家里来

的,当然也没有房租一说了。老人因为耳朵聋,平时很少和我们聊天,我们见到他,都会在他的耳边叫一声“公”。“公”对我们兄弟两个(当年小弟弟还没有出生)极为宠爱,我们若坐着他的垃圾船出去玩耍,他老人家就会用一只手抱着我们,只用另一只手划桨。他老人家会一路上给我们讲些鬼怪故事,或者给我们讲一些观云识天气的常识。我们有时傍晚才回来,少不了被外婆一顿臭骂,因为吃中饭找不到我们,把外婆急死了。而聋老汉也不申辩,只呵呵地笑笑。我和弟弟则开心得不得了,一个童子对他说啥还不是白搭?后来“公”实在是年纪大了,垃圾也捡不动了,便被他绍兴唯一的侄子接了过去。

“公”走后不久,外婆又接了一

个老人回来住。外婆说看他每天要挑着担走很远的路来附近,为他们生产队打扫几个厕所(粪归生产队灌溉庄稼),实在太辛苦了,就叫他住下可以轻松点。这就是后来我们口里的“老娘舅”。同样的,“老娘舅”也在我们家住了十多年,到干不动活了,才被他儿子接回家去。“老娘舅”家里有几有女的,逢年过节基本上都要回家,倘若不回家,我们就和他一起过节。我们是居民,吃的全是陈米,“老娘舅”吃的都是生产队的口粮,当年的新米。我和弟弟就想吃他从家里背来的又糯又香的新米,外婆总是拦着不让我们多吃。

外婆很长寿,活到94岁,无疾而终。她也是当年那条老巷里最高寿的。如今想起外婆,我心中总是充满温暖。

○姚伟鹏

凡人不凡

我家歌星

○邹建中

妻,素美,爱歌舞。一日中午,赴友宴,友问:你那口子为何不来?我答:她在合唱团练歌,稍晚便到。友笑曰:既为歌星,练歌事大,吾等但候无妨。须臾,妻翩然而至。席间诸友话题,自然针对歌星,如唱歌利于身心健康云云。

自此,妻多了歌星名号。我亦常以歌星唤妻;每每此时,妻一笑了之。

记得那日杭州某女子合唱团招聘,妻经不住诱惑,便去应试。众目睽睽,妻毫无惧色,一首《九儿》下来,团长当场拍板录取。妻后来说,胆大做将军,豁出来唱,杂念少了,反倒成了。其实,我有数,妻为进合唱团,那首婉约缠绵的电视剧主题曲,唱得家里到处是它散落的音符。我受其影响,那旋律老是挥之不去,一如耳鸣。

合唱团一周要去两次,妻乐此不疲。每次去时,精心打扮,从不马虎。常常为了找到搭配和谐的衣裤或裙子,弄得镜前床上一片红绿。这行吗?搭不搭?妻爱问我,我便从实答之。一旦我摇头,妻绝对不会固执己见。妻对我之审美,一向认可。对于妻之祈求,我不厌其烦。

常常,我坐在客厅旋转沙发上,围绕试装的妻调整角度,好不辛苦。完了我会发“牢骚”:唯女子与歌星难养也!妻却娇嗔:团里个个如此,我岂能随随便便不修边幅?我说:歌星,自然要有歌星范儿,马虎不得。我知道,那合唱团,有教师,有公务员,有媒体人士,虽大多年过花甲,但个个穿戴合宜,气质不凡,言谈举止,有模有样。可不,都文艺战士了,得有腔调。

我家歌星,乃是下岗职工,一介平民,然而,久与我这作家为伴,潜移默化,耳濡目染,平日常待人接物,遣词造句,实非寻

常人家女子可与之媲美(嘘,自吹了,打住)。

日前,妻在微信聊西湖荷花,竟有南宋杨万里先生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之句脱口而出。可见,此时之妻实非彼时之妻,自当刮目相看矣。

既为歌星,自然以唱歌为本。歌星在家,作业甚勤,听录音、看歌谱、记歌词……锲而不舍,一丝不苟。此外,还根据专业要求练习发声;口中行活亦日益增多,什么丹田出气,什么腔体共鸣,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碰到难唱的歌,如一首用俄语唱的《茨冈》,歌星便一字一句,雕琢打磨,力求完美。听妻练歌,实在是一种享受。有时练习晚了,妻就亏欠地说影响你睡觉了;我说,没事,催眠曲而已。听着靠在床上的妻之轻声细语的歌儿入睡,真乃人生快事!

一日,妻从团里回来,欲言又止。我问何故,她说,要参加市里比赛,团长给大家排位置,谁前,谁后,谁中,谁旁。结果令人不快:团长号令贯彻得有点费劲。我问,那你的位置呢?妻说,我听团长的,让我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妻又说,合唱团最重要的是一个字——合。合而为一,分不出你是谁我是谁,这就是合唱团的特质。

听妻如此说来,我不禁亦有了一番感慨:合唱团不需要歌星,要的却是寻常歌者——一个能进入无我状态将自己完全融化于歌声之中的歌者。比赛回来,妻让我看视频,定睛搜索,竟不知其在何处何方。等到视频有了拉近镜头,我才发现,妻那几近淹没于众多脸庞中的从容平常的样子。我禁不住,鼻子一酸:此,吾妻也!

如此看来,我家歌星,还是改称我家歌者为好。

悠悠岁月

无冕“老太”

○徐之维

无冕“老太”不是我母亲,也不是我老伴,其实是个带些尊敬味道的绰号儿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因一而再地缠绵流连于初中,被父亲“发配”到绍兴上灶农场“支农”。我到农场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无冕“老太”——一位年龄不大但长得有点老相的女人。她的笑容很亲切、很诚恳,但我却从中读出了些许忧伤。

“老太”带我去见“蔬菜班”班长马志清。班长长得挺帅,很man,一开口书面语言不少。其实,我哥早就告诉过我,农场里的场员都是知识分子——中学毕业生。这让我颇为自惭形秽:我是个留级坏,且“蝉联”两届。

“蔬菜班”的农活相对轻松,不过还担负着全农场的物资运输任务,大部分往返农场与县城间的货物,都得由我们“蔬菜班”从水路走,而运输工具就是两条全靠人力撑和绳纤拉的大木船。

夏日的山路上常可见挑着担搬运蔬菜和货物的农民,他们不但打赤膊且连下身也片甲不留,彼此“赤诚相见”,习以为常。开始我以为农民是农民,我们是我们,未料料我的想法很快被颠覆了!

我跟老场员进城运货,发现我的同伴居然也是赤条条地拉纤的!这太奇怪也太好笑了,莫非就为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么?后经“过来人”点拨方明白:原来,穿短裤太浪费!因为买短裤要布票、钞票,洗短裤要肥皂,还要肥皂票、钞票,这一条短裤开销不是一般的大!悄悄地说一句,我也随乡入俗啦。

此事传到“老太”耳中,她语重心长地在食堂屋檐下和我谈了一次话。她是农场的生活委员嘛。“老太”还是蛮风趣的,跟我讲人类进化史,讲农场场员要向农民学习什么、还要向农民宣传什么。什么彼此改造、共同提

高进步,拉近城镇距离等。噢?这“老太”哪里还有什么忧伤,那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女性活力和魅力,是一股强大的正气啊!

我成了“老太”的传话员,向班长转述。班长又专门召集班会进行了一次讨论。

此后,不管是场员还是农民,不再如此赤身裸体了。

1964年夏末,上灶遇到了一次山雨风暴。那是后半夜,风雨直入我们漏雨的宿舍,蚊帐、草席和人都湿透了。忽然,狂风中传来断断续续的喊声:“猪棚……猪棚……”,大家出门望向猪棚——闪电下,猪棚和猪都没啦,只有一个人影,跌跌撞撞地扑进屋来,竟是只穿了一件湿透了的运动衫(那个年代女性的布内衣)的“老太”!她的双手吃力地抱着用花衬衫裹着的物件,正在“咕咕、咕咕”地自报山门“俺是小猪仔”……

次日,那些失踪的猪找到了,死的活的都有。于是,猪棚赶紧重搭,活猪重新进栏,小猪也重回它们亲生的母亲那儿。雨后,一切照旧,劳动生活日复一日。而我对“老太”增添了几分敬重,还特意从大队小卖部买来一盒饼干,交由班长一并带给“老太”,她因为淋雨发烧了。

那年年底,“老太”喊我去场部办公室,见场长陈明康正与我小哥在聊天。

这一天,我才明白自己是被父亲安排下乡的,半年的农场劳动全是义务的,每月所得的“新场员基本生活补助”,全是父亲发给我的。

当天,我站在经常拉纤的那条船头,向陈场长、班长、“老太”等人挥手告别。但“老太”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。其实,“老太”是一位失去父母的孤女,高中毕业后就以农场为家,她一直在给农场的知青们一个家的温度。

往事如歌

很“面白”的日文汉字

○孙国翔

女儿是名中学老师,班主任。最近一段时间,发觉她比往常忙了许多,回到家里啥家务事也不帮着咱们干,只是躲在房间戴上耳机捧起书来看。一问,原来她已符合申报副高职称的条件,这阵子正在抓紧复习英语,争取顺利过关。

时光如过隙白驹。倏忽间,女儿都有晋升副高的条件了!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十多年前,我为了通过职称外语考试,死记硬背,临时抱佛脚的种种趣事。

那时评职称还不像现在,对老同志有外语可以免试这样的人性化政策。职称外语考试通过,个人论文发表以及获奖作品的数量是三大评审硬件,缺一不可。为顺利晋升副高,当时年届五十的我足足花了大半年的时间,非常辛苦地和厚厚的一本职称日语教材较上了劲。之所以选择日语,并不是因为

我有很好的基础,而是出于无奈——与英语相比,日语教材中出现的大部分汉字总是认识的,而英语,我却背不出10个单词。于是,没一点日语基础的我,硬着头皮报名参加了一个专门的辅导班。

去上第一堂课的路上,一阵很大的风刮来,将我已很稀疏的头发一下子吹散,也将我的心吹得凉嗖嗖的,心绪也突然散乱起来:如果课堂上坐的都是些可以做我儿女辈的同学,单看他们向我投过来的眼神,那韵味就足够让我喝一壶了。

忐忑中终于走进教室,坐下,很掩饰地瞄了瞄左右,这一瞄顿时让我踏实了不少:因为在很亮的日光灯下坐着的,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大龄学员!

任课老师具有非常出色的应考经验,他并不是从类似汉语拼音一样的五十音图(平假名、片假名)

教起,而是直接从以往职称日语考试所遇到的题例入手,逐句逐段地解释其意义,同时分析语法构成,以及考试中必须注意判别的似是而非的问题。于是,在第一堂课上,我们就认得了很多个尽管与中文读音有所不同,但形状、意思几乎一样的日文汉字,比如:学校、先生、劳动、北京、日本等等。

接下来,更多的日文汉字走进了我们的记忆。但老师还是经常提醒我们,有许多日文汉字的意思是与当代中文的意思风马牛不相及的,千万不可望文生义,否则就会出洋相。打比方说,“勉强”在日语中的意思是“学习”;“手纸”并非是人厕用品,在日语中是“信、家书”的意思;“元气”千万不要同中医郎中挂起钩来想,在日语里指的是“有活力、很精神”。哈,“泥棒”又是指什么?译过来会让你忍俊不禁,原来它是指“小偷、歹徒”;

我被KOL了

○王珍

你还读书吗?多多问。当然啊!不管世界怎么变,读书人的身份不会变。不过我喜欢读纸质的书。

多多随身带的,除了苹果电脑,还有一本书——东野圭吾的《风雪追击》。

东野圭吾是电气工程师变成推理小说家,也是我继川端康成、渡边淳一、村上春树后认识的又一位日本作家。

多多把他刚刚翻过一页的新书送给我,有清新的印刷味道,是我一直喜欢的味道。

多多又说,一年看50本书,够吗?

书可以由我自己挑,把书单给他,然后他掏钱去买来快递给我,又然后,等我看完了把它卖掉,卖掉的钱再放进我的钱包。

什么?什么??什么???我怎么没听明白呀:免费白看书,还卖书赚钱?那你不是要我替你干什么苦力吧?

多多一脸憨厚中又带着一丝得意的笑:“你什么都不用做。因

为你是我们的阅读师。”

之前,他还曾经任命我为他们的美食品鉴师呢,我怎么都这么喜欢啊!

不过,我这人有个坏毛病,喜欢得寸进尺——除了榴莲蛋糕、海鲜面,你干吗不再弄365种美食,让我天天换着花样品尝呢?

多多说,其实,我不太喜欢做美食之类的事,更喜欢开发创新的平台。比如目前手头上正在做的这个平台(名字有些怪,叫“二叔”,在AppStore和安卓应用市场可找到)——把一本书读完之后,打个折扣卖掉。

这样做的好处是:一来,你读书时会更爱护书,尽量保持书的挺括、干净,以保证书的二次卖相,这也应该是读书人爱书的好习惯;二来,可使资源有效循环利用,杜绝浪费,有益环保。因为,值得花数万一平方米的屋子去收藏的书并不多,大多数书在读完后就完成使命了,你卖出去让没读过的人来读,“剩余价值”总好过卖废纸吧?且还有附加值:第二个人在阅

读你读过的书时,你们共同的情趣、品味会营造出一种气场,这种气场会让一本书变得有温度。还有可能你们在买卖书的时候会有交流沟通,可以以书会友。我们的平台还会把你卖出的书做一个流向地图,看着一本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,从一个读者的手到另一个读者的手中,书又延伸出更多的故事。这样书会变得更加厚重……

多多这个人有一特点,一说到他自己的兴奋点,语速快得根本不是让人听清楚的那种,我一直怀疑他的嘴巴是不是租来的,是不是要计时收费的。所以,难免会给人天花乱坠之感。不过我还是常常能够发现他有很不错的创意。

至于他如何从中营利,这不是我一个阅读师该操心的事儿,既然他能把自己从一个屌丝变成土豪,他就不是个专做赔本买卖的主。我对他太有信心啦!

看我频频点头称是,多多的惯用培训法则就开始了:不管是品鉴师还是阅读师,有个专业的名字叫